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军事安全分析及对策思考

秦 天

内容提要：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是21世纪世界格局发展演化的最大变量。这一进程是否能顺利实现，从内部看，不仅在于中国的不懈努力，也在于中国对主要风险、威胁的有效防范；从外部看，不仅在于中国自身的愿望和追求，也在于世界主要国家对这一现实的战略应对。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矛盾相互叠加、激荡，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构成许多新挑战。能否以前瞻的判断、正确的思路、坚定的决心和有效的举措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是中国始终需要认真研究及创新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关键词：国家崛起 军事安全 基本思路 战略对策

军事安全，是国家有效消除外部武力威胁和战争风险，确保生存与发展利益不受侵害的基本安全条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当前，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对军事安全战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全面加强对国家崛起进程中军事安全风险的研究分析，进一步创新军事安全战略管理理念，丰富和发展管理手段，增强对军事安全态势的宏观把握和有效控制能力，努力遏制军事安全风险，为维护国家根本安全和发展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力保证，已成为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

一、新时期军事安全状态评估的基本思路

军事安全状态，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军事安全总体状况的客观体现，是判

秦天 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少将。

断国家基本安全的重要指标,也是指导国家军事安全能力建设和筹划战略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以往对军事安全状态的评估,受建国以来国家安全环境的客观制约,在各历史阶段通常都是以受外部威胁的不同情况作为主要评价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新特点、新变化,为科学指导军事安全能力长远建设,实施积极、主动、系统、稳定的战略管理,全面提升有效应对各种安全挑战的国家综合安全能力,应结合实际创新观念,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和自身特点的军事安全评价体系。

构建新的军事安全评价体系,应着眼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积极塑造和前瞻谋划,积极引入临界管理理念,以国家可能面临的军事安全风险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风险因素为重要关注,及早判明警示征兆,前移防范重心,掌握战略主动,有效降低和化解安全风险。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在新时期对国家军事安全状态的评估,应将国家外部威胁视为一个始终存在的“常数”,而将时代发展,特别是自身和战略对手的发展作为一个“变量”,以此为背景,来反思和分析在安全环境及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存在哪些容易引发风险的隐患,以期在宏观上更加清晰地把握国家军事安全的当前状态和总体趋势。具体说,新时期国家军事安全基本状态的评估方法,不是以国家是否面临现实军事威胁为主要依据,而是将威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以国家安全底线与军事能力极限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客观评价国家军事安全状态的主要依据。

国家安全底线,是保障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安全的最低限度,主要包括领土不被侵犯、国家不被分裂、政权不被颠覆、主权不被践踏、发展不被威胁等。军事能力极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支撑下所能运用的最大整体军事能力,主要包括战略防御能力、战略进攻能力、战略威慑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和国防动员能力等。形象地说,国家安全底线和军事能力极限之间关系就像床和被子的关系,安全底线是床,能力是被子,被子盖不住床就不安全,差得越多就越不安全。

安全底线是床,
能力是被子,被子盖
不住床就不安全,差
得越多就越不安全。

按照这一标准,军事安全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状态:

安全状态。即国家军事能力极限远远大于维护国家安全底线需求,国家处于安全能力供给充裕,能有效应对局部武力挑衅和军事冲突、遏制全面战争威胁的军事安全状态。

相对危险状态。即国家军事能力极限与维护国家安全底线需求大致相当,国家处于安全能力供给相对紧张甚至短缺,难以有效应对重大军事威胁,军事安全风险趋向临界的相对危险状态。

无安全状态。即国家军事能力极限远小于维护国家安全底线需求,国家安全能力供给严重短缺,无法有效应对武力挑衅和战争威胁,国家事实上失去军事安全的状态。

军事安全状态有以下特点:

1. 军事安全状态不是静止的,是由国际安全环境、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战略对手的威胁和自身军事能力等重要因素所决定,并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自身综合国力的消长,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而动态变化的。因此,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中,客观研判国家军事安全需求的具体变化和军事安全能力的现实状况,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影响军事安全的风险一般可分为“军事危险”和“军事威胁”两种性质。军事危险,是指国家军事安全隐患所形成的一种不安全状态,是可能导致军事威胁的各种因素;军事威胁,则是指国家爆发军事冲突的现实可能,是军事安全的临界状态。军事危险是预期的安全风险,军事威胁则是现实的安全风险。军事危险与军事威胁相互联系,但不是绝对的递进关系。个别军事危险的临界,不一定会形成军事威胁,但大量军事危险的长期存在和临界趋向,则必然引发军事威胁,导致国家军事安全的临界。深刻认识和理解军事危险与军事威胁的不同性质及相互关系,是正确判断国家安全形势,指导国家军事安全能力建设,有效减少危险、遏制威胁的重要条件。

3. 军事安全的获取,不同国家有不同实现方式。有的国家是通过结盟战略获取集体安全,如北约、沙特、日本、韩国等;有的国家是采取自主战略,通过独立发展军事力量获取自主安全,如中国、俄罗斯等;有的国家是通过中立获取有限安全,如瑞士等;另有一些国家则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权益,采取依附战略来换取部分安全。军事安全实现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安全目标、安全质量和安全成本的差别。

4. 尽管对军事安全的追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现实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处于安全状态,如美国和俄罗斯。大多数国家一般处于相对危险状态,还有一些国家则处于无安全状态。当一个国家处于无安全状态时,由于对任何可能的国家军事安全危机,都缺乏有效应对的战略资源和手段,因此事实上已丧失了遏制战争,抗击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能力,在现实的国际生态环境中,随时可能成为霸权体系任意讹诈的对象,甚至成为其肆无忌惮地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的首选目标。

越战后几场世界局部战争实践充分表明,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军事体系,在动用战争手段维护霸权时,所选择的打击对象,都是自身军事能力极限远远小于维护国家安全底线需求的国家。这一严峻现实,为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深刻认识自身安全能力的客观方位和本质作用,提供了重要标准和警示。目前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安全能力之“被”与国家安全现实需求之“床”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客观上是缩一缩盖得住,伸一伸就盖不住。中国是军事安全完全依靠自身能力的大国,而中国又是唯一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我国当前在领土、主权方面始终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在其他权益方面也不容乐观。如果中国没有应对军事风险的能力,就难以可靠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安全。因

此,加强中国军事安全能力建设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和急迫的,努力发展与国家实际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军事能力是硬道理,对此要坚信心不移、坚定不移。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主要军事风险分析

军事风险,从国家层面来说,主要指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宏观威胁的风险。对未来我国安全环境变化和可能面临的军事风险的判断,应放在大的背景下来思考。其中一个最大变量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影响中国、影响地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实力的相对衰退,新兴国家力量的快速发展,国际体系重心显露转移趋势,这些因素叠加必然会对国际和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大背景大趋势影响大格局和大战略,进而影响着国家军事安全形势。总的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严重现实军事风险的可能性相对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四个没有改变”和“三个持续改变”所形成的总体基础所决定的。

“四个没有改变”:一是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美国依然是唯一的主导国际事务的超级大国,但其战略扩张和肆意称霸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以战略守成为主旨的战略调整,应是其较长时间的战略基调。在此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因素相应提高,而直接发生硬碰撞或引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相对降低。

二是中美之间以合作为主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也取决于国际条件变化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应对,特别是美国因素的制约。中国和美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双方既有各个层面的利益交互,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冲突并非必然导致两国走向对立。如果中美两国对立和对抗,受损伤的就不只是中国,美国也会因为对手过于庞大而消耗绝大部分资源,进而损伤美国的根本利益并迅速走向衰落。事实上,中美两国合作有巨大空间,而对抗没有赢家。因此,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会更多,但这种斗争基本是合作框架下的斗争。因这些矛盾和摩擦而导致中美完全走向对立的可能性较小。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会更多,但这种斗争基本是合作框架下的斗争。

三是由于地缘因素和现实利益的关系,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结构性合作需求大于权宜性防范与遏制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世界历史上后发国家的崛起,几乎都遇到来自国际霸权体系的战略压力。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受某些大国对华政策和立场施加的影响,周边一些国家加重了对中国防范、压制的集体倾向。出现了在经济上依靠中国,而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政策取向。但随着时间推移,周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将越来越深地同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

在地区安全稳定上也将越来越难以离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此背景下,出于谋求本国现实利益最大化和维护长远利益考虑,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不应是其长远的战略追求,而只是一定期限内的权宜性策略选择。因此,尽管在我国崛起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冲突会增加,但局势基本不会失控,越向后就越不会。

四是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抓住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和方针没有改变。中国不仅在走向强大,更在走向成熟。中国不会因强而霸、恃强而横。地区局势的稳定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因此,在各种外部矛盾冲突中,保持最大的战略克制必然是中国的主动选择。

三个持续改变:一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将以大幅提升而持续改变。二是中国国防能力将以大幅提升而持续改变。三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区影响力也将在大提升下持续改变。

在以上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军事安全环境出现严重问题和根本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安全环境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现实的、急迫的军事威胁有所缓解,而未来我国潜在的军事风险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趋向严峻。这些潜在风险,从外部看,主要来自某些大国对中国的敌性判断和敌对战略安排,总体特征可能表现为其针对中国的负面意图被持续放大。具体而言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继续在中国周边挑动和制造摩擦,鼓励和支持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恶化中国安全环境。二是伺机利用各种分裂势力进行分裂活动,制造紧张局势,借以牵制和干扰中国。三是加快针对中国的军事布局 and 准备,为必要时的武力摊牌创造条件。美国“空海一体战”构想,本身就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其核心就是消除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行动、顺利实现任何战略意图的可能干扰,换句话说,就是消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可以威胁中国的任何障碍。所谓“空海一体战”,就是要谋求你打不着我、看不见我、防不住我,而我看得清、够得着、打得准、毁得狠的战场单向透明、实力单向倾斜、局势单向操控的结果,以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以上三点,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可能各有侧重。

而从内部看,潜在的风险主要在于我国应对军事风险的能力准备和策略准备是否充分、到位。从能力准备方面讲,必须看到的是,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中,我

对于这种能力的发展,一方面内部一些舆论有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外部一些舆论又有过多误判。

国保证国家军事安全的现实能力,客观上仍明显不足。但是对于这种能力的发展,一方面内部一些舆论有过高预期,另一方面外部一些舆论又有过多误判。从策略准备方面讲,在国家崛起进程中我国将不断遇到安全上的新问题新挑战,而我国相应的战略创新能力和理论对策储备与形势任务发展相比,应该说还有不少差距。具体而言,主要在于对安全形势

的战略走向和风险因素是否有准确把握;对安全态势是否有长远的筹划、积极的塑造;对可能的各种风险是否有周密的准备、配套的方案、灵活的举措等。

以上这些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因素,在国家崛起进程中如不能加以有效消除和弥补,就很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相互作用、迅速转化为现实军事威胁,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三、加强军事风险管控的对策考虑

为有效应对未来军事风险,应更新观念,前瞻筹划,强化能力,创新策略,主动作为,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可靠保障。

(一) 确立军事风险管控的基本原则

根据军事安全形势和现实安全需求,加强军事风险管控应确立“积极预防、主动营造、有效控制、全力化解”的基本原则。

积极预防,就是针对国家军事安全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威胁,前瞻预测,宏观把握,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与防范,以临界管理的思路创新军事安全状态评价理念,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危险,从基于对手的意图转向基于自己的能力,从基于应对准备转向基于实力准备,以国家安全底线与军事能力极限为标准,对国家军事安全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和超前评估,及早识别可能危及军事安全的诸多危险因素,前移战略管控重心,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积极干预,力争减小和化解安全风险,防患于未然。

主动营造,就是变被动应对为主动作为,打破守成,借局布势,通过积极的行动引导消极因素向积极方向转化,塑造和改善国家安全态势,赢得战略上的主动。主动营造,重在谋势而不是谋局,在操作层面上既可通过对话、合作、协调、妥协等方式积极发展国家间关系,妥善处理矛盾,努力构建互信互利机制,减少形成风险的各种因素;也应充分运用日益增强的国家影响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以创新的思路突破“安全困境”,在适当时机,可考虑主动谋划建立区域军事合作机制,以我国为主导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增强中国军事能力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减弱“中国威胁论”的话语条件;必要时还可综合运用威慑、阻吓、积极反制等方法,妥善应对局部的威胁和挑战。

在适当时机,可考虑主动谋划建立区域军事合作机制,以我国为主导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产品。

有效控制,就是系统监测和把握国家总体安全目标及各分支目标的实现进程,预测发展趋势,监控风险演化,及时发现偏差与失误,及早采取纠正措施,以临界管理的思路综合施策,包括在适当时机对一些安全风险实施“正催化”的干预,即在慎重选择和有效控制下,主动将部分预期高危的风险局部性引发,以

提前释放破坏能量,防止其扩大性聚集形成严重后果。努力从宏观上及时纠正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安全趋向,消除各种军事安全隐患,扭转和优化战略态势,避免危险状态临界,减少可能付出的代价。

全力化解,就是积极采取各种手段有效消弭各种安全风险,避免危机和冲突事态扩大及恶化,减少和消除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为此,一是要积极培育和提升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核心军事能力,夯实遏制危机的实力基础;二是要积极主动,灵活合理的综合运用这种能力,以有效应对和遏制危机,及时阻断各种军事安全风险的递进演化,在必要时打赢维护国家安全的合法性战争。面对安全挑战,特别是当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只有果断采取行动,才能迅速化解对国家根本安全可能构成的危害。

(二) 推动军事风险管控由基于应对向基于建设和预防转变

建国以来,我国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管控军事风险的实践,可从不同角度划分为多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有各自的特点。然而从根本上看,长期以来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及风险管控的性质基本属于备战应急范畴,这也是新兴国家新兴制度一经出现所必然面对的现实。由于面临外部敌对力量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紧迫威胁,在特定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只能针对具体对手乃至具体作战样式被动展开。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了适时转变军事斗争准备模式的条件,应积极推动军事斗争准备由被动应对威胁的“备战应急型”向注重建设与预防的“主动运筹型”转变。这是争取和扩大战略主动,加强能力建设的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确保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消除军事安全隐患,整体优化军事安全战略环境的重要途径。

在军事能力建设上,应从基于现实威胁的能力准备向基于长远威胁的能力准备转变,以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为统揽,全面谋划我国未来军事能力建设的总体方向,对发展目标、力量结构、能力要求、实现路径等方面都做出前瞻、科学的总体规划。要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确立军事能力发展的总体思路,而其核心是缩小关键能力差距和强化反制能力的准备。从我国现实情况和基本国策看,我国未来战略能力的建设,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面追赶主要战略对手,无论将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如何提升,都应坚持军事力量的防御性使用。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安全保证,但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军事力

利益的全球化存在,并非要以军事力量的全球化存在为必然条件。

量随着利益拓展的全球化延伸。利益的全球化存在,并非要以军事力量的全球化存在为必然条件。发展全球化的军事力量,在客观上既难以实现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与“为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的要求相悖。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军事力量发展的能力定位,应

以有效保障我军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为有限目标。根据这一命题,未来军事能力建

设的总体方向,应是以关键能力为支撑,积极而有限的拓展整体军事能力的有效控制范围。根据形势任务变化,未来我国应确立“地区性大空间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全面谋划我国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总体布局和建设思路。应以体系能力建设固本强基,以特殊能力建设打破困局,以跨越突破的思路谋取新一代战争的“入场券”,打破主要战略对手对战争能力优势的垄断,争取相对的战略平衡,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建设是预防的基础,除了能力建设外,还应特别重视环境建设。应深度综合经略各战略方向,扩大和巩固以互利、互惠、互信、互助为基础和纽带的地区合作,逐步拓展延伸境外战略空间,整体优化我国周边战略环境。

(三) 完善国家战略能力生长和危机快速反应机制

战略能力是运用战略资源和手段实现战略目的的能力,核心是军事能力。加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是有效实施军事风险管控的重要基础。为保障国家战略能力持续增强和有效释放,当前应重视建立和完善如下机制。

安全与发展同步规划机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富国强军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先富国、后强军”的理论和实践,必然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内伤。因为安全问题是全程性的,一方面,国家的快速发展必然提出更多的安全需求,如果军事能力不能及时提供相应的支撑,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和军事能力的发展又有其内在的周期性,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因此通过突击性发展安全能力来应对突出安全问题,是行不通的。从当前看,我国国防投入不足与保障国家安全需求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应看到,“丛林时代”虽已结束,但“丛林法则”依然存在,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奉行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大国来说,国家基本的安全自卫能力不仅只能通过自身提供,而且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合理比例才能满足基本的安全需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应进一步改进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协调好国家安全筹划与国家发展规划之间的关系,统筹指导各领域发展工作与安全工作,防止在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中,出现发展与安全相互分离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以获取最大的综合战略效益。

战略动员机制。根据应对未来危机、冲突和战争的需要,完善和优化国防动员机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在平时与战时的职能任务,规范动员程序,统一协调经济与军事、军队与政府、地方与部队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民战争的实现途径以及综合国力快速释放的有效方式,为国家战略行动提供有效保证。

危机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统一领导机制,建立和完善国家军事安全预测预警体系,针对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充实相应的研究与咨询力量,从不同方面对当前及未来国家军事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可能发生的

重大危机做出前瞻性的系统分析,周密拟制各种条件下处置危机的综合方案,统筹常备力量、预制力量和应急力量建设,探索和建立高效的组织指挥体制,大力提高战略预警和响应能力。力争尽早遏制和化解危机,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战略主动。

(四) 突出军事风险管控的重心和重点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时期,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干扰性问题会进一步增多。但是,我们有效应对安全风险的战略能力建设不可能短期内形成,在使用上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此,应突出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紧紧抓住军事风险管控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以此带动其他矛盾问题的解决。

未来一个时期,管控军事风险的重心是制衡和应对主要战略对手,重点是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和维护周边安全。历史地看,引爆军事风险、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往往不一定是在我国与主要战略对手之间,也不一定在我国预设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但是,只要我们具备了应对主要对手、确保主要方向安全的战略能力,就能够掌握控制全局的战略主动,能够较从容地应对来自其他对手和其他方向的军事风险。同时要积极运筹国际关系,把塑造对我国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作为军事风险管控的重点,加强对大周边安全的战略设计和建设布局,深入探索当代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以彼此的利害关切和共同的利益需要为着眼,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及和谐稳定的周边关系,使更多的国家在合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能合理分享中国安全稳定的红利。在安全环境建设过程中,中美关系始终是一对主要矛盾,而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和现实影响力,但美国也必须清楚中国的利益边界和底线。如果美国连中国维护自身利益边界和安全底线的努力也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挑战,那中美之间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未来能力建设的
重点在东面,环境建
设的重点在西面。

从营造军事风险管控的战略条件上看,总体而言,未来能力建设的重点在东面,环境建设的重点在西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军事风险有可能主要来自海上方向。而从我国统筹海上方向建设与准备的战略布局来看,应区分应对和建设的重点,将各方面的问题有机结合,置于战略全局中整体筹划、有序推进。从陆上环境看,虽然我国西面面临的现实军事风险相对而言并不急迫,但西面的安全环境建设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必须充分利用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发挥我国地缘优势,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深化安全与发展关系,筑牢安全与发展的根基,为国家利益拓展和国家发展崛起创造更为坚实的战略支撑与依托。

（五）军事风险管控不能以放弃核心利益和原则为代价

军事风险管控是实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手段，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核心利益往往就是战略底线，在核心利益上决不能无原则退让，安全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危及国家根本安全和生存基础。在必要的时候果断使用军事手段同样是加强战略管理和临界控制的重要内容，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能力和相关方案的准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主动使用武力或随意使用武力，而是强调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在特定的情况下，适度而恰当地运用硬实力以维护核心利益，这本身也是对战略底线的明确界定和宣示。

硬实力的适度运用与破解大国崛起困境并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相辅相成的。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防御性地使用必要手段，坚决维护我国核心利益，遏制和阻止一切挑衅行为，是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

（六）保持最大的战略克制，释放最大的善意尺度，拓展最大的协调空间，永远应是中国处理外部矛盾和摩擦的基本立场

中国反霸不称霸，既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我国的发展崛起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将层出不穷，保持最大的战略克制缓解矛盾，释放最大的善意尺度减少矛盾，拓展最大的协调空间解决矛盾，既是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各种外部矛盾与摩擦的自主选择，也是我国积极管控各种现实风险的必然途径。但同样肯定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也永远不会以原则作交易。

我们要向周边和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想与别人为敌，但别人也要明白与中国为敌的后果；中国不想挑战美国，但美国也要清楚中国的利益边界和底线；中国需要稳定，但不需要牺牲主权和利益的稳定；中国需要发展，但不需要损害国家安全的发展，中国热爱和平，但我们也不害怕战争。